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书海泛舟

《共产党宣言》一段经典译文的演变

□ 孙建昌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的这个经典段落，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但这段文字的早期中译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译文在措辞、文风上有较大差异。在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史上，这个经典段落被一再重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形成今天的“定译”。

现有资料表明，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之前，上述经典段落的中译文，早在1903年即见诸中国人出版的译著中。

1903年2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一书。该书有关章节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书中提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宣言书”（即《共产党宣言》），“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并把《共产党宣言》第四章最后一段译为：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

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共产党宣言》结尾段最早的中译文。

1905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专门介绍马克思（译为“马尔克”）的生平和学说。文中称赞马克思“其所为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在该文中，朱执信将上述经典段落译为：

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訾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源泉。

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把赵必振的译文和朱执信的译文与今天的译文对照可以看出，二者都未将《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共产党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层含义译出。赵必振用的是“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的措辞，而朱执信使用了“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的表述。“改革”也好，“更新”也罢，他们都回避了暴力革命的意涵。另外，原文中所传达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思想，在二人的译文中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来。至于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赵必振的译文中被省略了，朱执信则将其译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把“无产者”译为“平民”，明显受到当时日译文的影响，原文所揭橥的“团结”或“联合”之意也未译出。

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报》第5号发表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在“叙论”中再次摘译了《共产党宣言》这一段落的内容：

马尔克（Karl Marx）之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

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应当说，宋教仁的译文比上述赵必振和朱执信的译文在传达原文思想方面都更加贴切。“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的措辞与今天“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用语，在意思上已经非常接近；“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无失，而“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比较，又可谓异曲同工。

1919年5月5—8日，北京出版的《晨报》连载日本河上肇著、渊泉（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中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若干段落，而结尾段的内容表述如下：

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

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勿懈！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这个经典段落有了新的译文：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利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从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宣言》又先后出版过华岗译本、成仿吾与徐冰合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校译本、乔冠华校译本以及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的百周年纪念版。其中，博古校译本发行量大，影响广泛，当时各解放区干部都是学习这个译本。在博古校译本中，《共产党宣言》结尾段是这样翻译的：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慄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将会得到整个世界。

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

1949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这个版本于同年运到中国。在百周年纪念版中，结尾段的译文是：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头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综上所述，《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早期经过一再重译，译文几经改变，其文体风格和意义阐释都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译介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由晦涩到通俗，理解阐释从模糊到清晰，译文措辞由含蓄到犀利，内容表达日趋凝练准确。到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问世，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典段落的中译文在措辞和意蕴的传达上都已经非常接近今天通行的译文，初步确立了其在中文语境下的文本形态。

以结尾的那句经典口号的翻译为例，1903年赵必振的译文中略去未译，1905年朱执信译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1906年宋教仁译为“万国劳动者其团结！”，1919年陈溥贤译为：“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勿懈！”，1920年陈望道则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并加注英语原文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此后，这句经典口号被一再重译。在博古校译本中，它被译为“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莫斯科印行的百周年纪念版中，首次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译文，并将其以红色字体印在版本的扉页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先例并形成惯例。

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对《共产党宣言》上述经典译文历史演变的考察和回顾，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中体会应当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基本经历了类似的演变过程。译文的确立昭示着思想的传播，革命话语的建构意味着革命思想的唤起，革命思想的传播意味着对革命行动的召唤。

书而思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四：礼

□ 钱 逊

礼，是从行为举止上讲。要遵守道德、礼制的规范。守规矩，讲礼貌，恭敬辞让，言行有度。

个人的修养、社会的运行都包含情感精神和行为举止，内和外两个方面；内在的情感通过外在的行为举止而落实和体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行为举止必须有规范。在中华文化中，这种规范就是礼。以上义、群、和三项都属内在的精神、价值，也都通过礼而落实。《论语》讲仁，“克己复礼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讲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讲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讲为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讲教学，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总之，一切都落实到礼上；“不学礼，无以立”。（均见《论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仪规范：上至朝廷议事、祭祀、战争，下至社会婚丧嫁娶、节日礼俗，家庭生活晨昏定省，夫妇、父子、兄弟相处，人际交往中的称谓、礼节，日常行为中坐、卧、立、走等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古代中国人是生活在礼之中。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功能，在维系社会和谐。人的生活是社会性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中，有一定的地位、身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古代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礼就是在这种区别、分别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映这种区别、分别，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别中求和。

礼的精神，恭敬辞让，言行有节。“恭敬之心，礼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恭敬辞让是礼的根本精神。“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的作用在规范和节制人们言行，使人言行有度。表现于言行，就是守规矩，讲礼貌，不任性。内在的义、群、和的精神追求和外在行为举止的恭敬辞让，言行有节相配合，塑造了中国人文质彬彬的形象，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名。

守礼一项，如何做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特别需要研究。一方面，礼的特点是随时而变，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今日的中国和世界，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而礼的变革远未能跟上。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特别是批判旧礼教的影响下，守礼的传统遭到极大破坏。由此造成礼的严重缺失，带来了社会失序和风气浇薄的不良现象。这里谨提出几点初步想法供讨论。

礼有形式和内容，礼仪和礼义两个方面。古代的礼仪形式，大多已不适用于今天而淘汰；今天要继承弘扬的，主要在礼所体现的恭敬辞让，言行有度，别中求和的价值和精神方面。古代，这种精神体现在守礼上，今天在以依法治国为基本国策的条件下，需要和可以把它扩大到更广的范围，体现在遵纪守法的所有方面，一句话就是守规矩。要把自觉遵守规矩的精神落实到各个方面，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社会的风气。对于传统礼仪，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或淘汰、废除；或推陈出新，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或拨乱反正，在恢复基础上创新发展。尤须注意的是，时代变迁，文明发展，社会生活也发生根本变化，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礼的体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亟需建立适应于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的礼，以丰富、发展旧有礼的体系。继承改造传统和创新发展新的内容，二者结合，实现守礼传统的创新性的发展。

韩愈的读书之法

□ 杨 海

《进学解》是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书中讲道，“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为勤矣。”这一论述集中而精辟地阐明了韩愈的读书方法。细细品来，的确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



韩愈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韩愈指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记事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阅读材料时要善于提炼与概括，拎起其基本要旨，以便于理解与记忆；而“纂言者”要善于深入挖掘阅读材料中的深层意涵与内容实质，进而写出自己的认识与体会。在韩愈看来，读书不仅仅是一股脑地埋头苦读，在自己的头脑中机械地堆砌大量的阅读素材，而是要边读边思考，边读边记忆，在读中思考，在思考中记忆，不断增强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能力，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样，读书才能从“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第一阶段进入到“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者焉，昭昭然白黑分矣……”的更高境界。韩愈认为，读书不是复制性地背诵“古圣贤人”的陈词滥调，不是对前人成果的沿袭剽窃，而是在汲取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韩愈在文学上具有较深造诣，造语生新，自成一家。这与他读书“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是分不开的。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正如韩愈自己所言，他以“读书著文”为“业”。既然读书是为了作文，那么文章的内容就必须丰富、充实。要想文章的内容丰富、充实，就必须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要想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就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韩愈阅读的范围相当广博。他认为，掌握和积累更多的知识是基础，否则学业就难以达到精深的地步。“读书患不多”，读书应广泛涉猎，如果读书仅仅局限于儒家经传，那学业与知识面有些窄。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记载了韩愈“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韩愈认为，不但要读诸子百家的书，还要读一些史书，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获得多方面、多领域的知识。正如韩愈在《答侯继书》中所言：“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韩愈更强调要牢牢掌握所读书中的知识，不管是大的方面的思想观点还是细节上的知识问题，都不宜随便将之抛弃，而须对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己有。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韩愈读书是为了恢复儒学的“礼”“道”，弘扬循礼治国。因此，他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他致力于整理古代典籍，以使世人明圣人之道。韩愈除了提供较为完整、准确的阅读范本之外，如对《荀子》《鹖冠子》《仪礼》等古代典籍进行了删校、辨伪的整理工作，他还详细提供了自己的阅读书目。为了实现他恢复儒学的远大志向，韩愈读书思想开明，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阅读内容。韩愈把学“道”与学“辞”结合起来，旨在为文明道。显然，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浮华空虚的骈体文有着重要作用。在整理古籍等倡导古文运动的过程中，韩愈不畏艰辛，脚踏实地。正如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在他那个时代，韩愈以读书学习为突破口，为扭转六朝以来浮华空虚的学风、文风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值得称道。

读书方法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要目

本刊特稿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刘 伟

专题·习近平战略思想

人民共创共享思想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系统阐发 韩庆祥

政治学

我国公务员信任公民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王浦劬

如何更客观地认识中国政治
——世界大历史维度与国际大空间视野 杨光斌

党的建设

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内化机制
——基于态度形成理论的分析 王永凤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双重面相
——基于法理学视角的考察 石 伟

法 学

预断防范：刑事庭审实质化诉讼层面之思考 汪海燕 于增尊

纪检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运用 朱立恒 王 超

社会学

论城乡经济发展机会的一体化需求、行动与社会发展 王春光 杨建华

经济学

逆周期调节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 温铁军 高 俊 董筱丹

全球化调整期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中国定位 佟家栋 刘 程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问题与转型 陈彦斌 刘哲希 郭豫媚

（上接1版）

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

习总书记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怎么样才能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习总书记强调，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定要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真正使践行群众路线成为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

首先，要制定好的制度。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习总书记强调，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制度怎样才能做到“精”而“管用”呢？“精”而“管用”的制度应该是务实具体、简便易行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就是一个典型。当时，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毛泽东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亲自宣布了“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以及“八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这个制度的每一条内容都很实在，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也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制度、这样一个纪律，我们党和工农革命军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和支持，建立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不断丰富完善，但其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的精髓始终没有变。我们现在不是缺少制度，方方面面都有相关规章制度，但是在制度规定的务实管用上，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如果一个制度空洞乏力、大而不当，或者复杂繁琐、操作不便，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肯定会流于形式。

其次，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制定是基础，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贯彻执行。习总书记指出，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并强调要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执行得不到位、不彻底，正所谓“处处高压线，就是不带电”。有了好的制度，就要强化制度的刚性运行，做到立说立行、严格执行，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对违反制度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增强制度的威慑力，防止出现“破窗效应”。据中纪委统计，截至2015年7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4万起，处理12.5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5万人，这其中还包括5名省级干部。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强化制度执行的坚强决心。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管担任什么职务、在什么岗位，都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的意识，自觉把制度当成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严格遵守、主动执行，严格按制度办事，绝不做违反制度、超越底线的事，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